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三民主義周刊

第二卷 第四期

民生主義的工業化之論據

于啓民

農業機械化與農業革命

李魯航

產業革命中之社會變動

李泰華

國父關於勞工問題的遺教(青年論壇)

陳定閔

文字的力量

柳無忌

短評

編者

本 刊 航 空 版

昆	昆	明	新	朝	報	館
蘇	州	州	省	南	出	社
蘭	州	新	省	印	版	局
成	都	都	快	報	報	館
街	陽	陽	大	報	報	館

編者及三民主義週刊社

重慶春森路三十號

定價每冊一角 半年二元五角

民生主義的工業化之論據

于啓民

一 中國經濟建設之核心問題

我們要研究中國的經濟建設，首先須認清兩個主要的前提：一個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動向，一個是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這乃是科學法則之科學的運用，前者叫做「特殊的」一般，後者叫做「一般的特殊」。因為全世界各地的經濟發展，乍一看雖然是形形色色，但如果將其分析、比較、歸納、綜合研究以後，便不難發現共同原理，就是無論那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遵循着共同的歷程演進來的；這歷程支配着一切人類社會，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一切社會的經濟演進，一方面固有其共同路線，但在另一方面，各個社會却仍然各有其獨自的特質。以時間來說，各個社會所屬的歷史階段就未必一樣，而在所佔的空間裏面，它們的自然環境更不齊一；因此，無論是主義抑或政策，其能適用於歐美者，未必即能適用於中國，反之，亦然，所以，我們在信仰上既不可輕率盲從，而在謀國時更不可削足適履。

試考人類社會的經濟演進，最初是原始的採集經濟，一進而為狩獵經濟，中間又經過畜牧經濟，再進而為農業經濟，然後更由農業經濟，發展為工商業經濟；這是東西洋各國的歷史事實。凡能循此歷程以進者，便可生存於現在的世界，否則必將如紅黑棕種人之日就衰微；現在已有多少落後的民族，都因為中途脫了這進化的共同軌道，變為歷史沉淪中的僵屍化石了。因此作者要鄭重指出：中國雖說至今還是以農業立國，然而今後的經濟建設，必須以工業為中心目標，乃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問題！這便是上述「特殊的」一般，也是「總理所謂『迎頭趕上』」的意思。他說：

「中國個個用手工业生产，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故必須「廢手工

，採礦器……以警其鉅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總之之「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補助中國鉅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

這「總理在『實業計劃』中所給與我們的訓教；而「總裁在『五大建設』」之中，更強調地特別指示：

「我們要建設物質發展經濟，尤須以「總理『實業計劃』」一書為根據。本黨同志要負起革命建國的責任，必須精研此書；並必須盡力指導人民，合國家和人民的力，以極度勤勞和刻苦來實行這個計劃，以奠定物質建設的基礎。」

二 中國的工業化絕對可能

以上是說：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以工業化為核心。但是或許有人要問：現時現地的中國，究竟有沒有工業化的可能？因為我們不祇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而且更須集中所有的人、財、物力，從事於神聖的長期抗戰啊！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遠在歐風東漸之始，中國就使其他的國家一樣，既需要生產手段之製造，更需要現代化的工業生產。時至今日，她不但在艱苦抗戰中從事建國，而且還要建設一個新型的國家。以國內情形而論，中國正和普法戰爭以前的德意志大致彷彿；至以國外處境而論，更不見得能比革命時代的蘇聯還要困難。這是說，中國的工業化不須急需，而且絕對可能。因為：

第一、我們的生產落後雖係事實，但之所以致此的最大原因，乃是帝國主義者外力壓迫的關係。試以第一次歐戰時期為例，我們各種的民族工業，不就是乘着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際，曾有一度的飛躍發展嗎？現在的戰爭期

開，反倒是我們工業化有利環境，因為許多的外商工廠，有的為敵人砲火摧毀，有的則限於環境而不能開工，換言之，這些素來宰息我民族工業的魔手，已被戰神嚇得縮回去了。

第二、平時各國過剩的洋貨，莫不以中國為傾銷市場，但自抗戰發生以後，敵人把我們的海口封鎖，遂使許多洋貨想來而不能來，於是傾銷的威脅不存了。

第三、我們集中財力抗戰的結果，使大多數人的購買力隨之減低，因此上等洋貨可以不用，而日用必需品也都喜歡以土貨代替，因為洋貨進口不但要受戰時的限制，並且運價增加而售價高昂的關係。

第四、戰爭逼迫我們要自力更生，這種時候，我們的智慧自然會發揮到極高的程度，於是有一些過去非用舶來品不成的機器——如增壓爐之類，現在我們也能自己設計自己製造成功了。

總之，即以這四種因素來看，中國的工業化也一定成功！我們知道，蘇聯與困難的艱難裏面從事工業化，已卓著成效；而過去德國工業化的經過，更可借鏡。只要我們肯發奮圖強，則將有中國工業化的成就，很可能地媲美「後來居上」的。

德國在十九世紀初葉的經濟落後，是研究歷史的人們所一致公認的。德意志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才開始建立了國稅聯合；當時三十八個大邦之中，亦不過僅將十八個參加這個組織而已。由此可見，當時德意志國內各邦的政治割據，是怎樣阻礙了她的經濟發展。這種現象，可以說是前半世紀來中國的情形想彷彿。誰都知道，德意志統一祇是在普法戰爭結束後才告完成。英國在這時已經把她的資本主義組織建立起來了。但在德國，這種近代資本主義的組織，亦即近代工業化的體系，却正與手工工業及家庭工業進行著決定意義的鬥爭，祇不過才開始樹立下一個雛型而已。這又是和中國最近的情形相差不遠。

但正因為德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前的經濟發展，主要的由於政治上制衡阻礙了它，所以肅清封建制度和統一國內政治的過程，本身就導引她在實力的發展達到了特別加速的程度。德意志各邦間關稅壁壘的剷除，統一了全德意志的國內市場，這個過程，就是德國工業發展真正加速的一個根源。

儘管在十八世紀末年，德國的工業化已見端倪，然而德國的工業與製造業之廣泛設立，則據各種統計所示，却都是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中所進行的一事蹟。以此與中國的工業發展史相對照，情形也總算很相似了。

德國雖在這種條件之下，矚目的走上工業之途程，然而德國以其技術優勢，很迅速地超過了英國的工業成就。這不但證實了工業化在落後的國家亦有可能，並且還給我先「總理所指示的「後來居上」，下了一個顛撲不破的旁證腳註。

誰都知道，英國在十八世紀就經過工業革命，及十九世紀前半葉時候，她已經掌握了全世界最堅實的工業基礎。那時英國已經是一個「全世界的一個奇特工廠」，一方面供給各國以各種工業品，一方面把各國當做自己農業原料的根據地。當德國熱烈振興工業的時候，英國早已達到工業發展的高度水準。但是就因為這個緣故，德國便不需要重踏英國工業化所走過的一切腳轍；她不但能夠站在工業先進國家一切最新技術成就的基礎上面，同時更利用科學的新發明，去建立她自己的工業基礎。

舉例來說，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開始了電機工業的迅速發展，完成了化學工業方面的許多革命，所以英國各種生產部門當中，電質化與化學化的設備造成為可能。反之，十九世紀後三十年代，正是德國根據最新的科學成果與技術而迅速建立其工業基礎的時候。英國因為在這個時代以前，早已有了建立良好的工業基礎，捨不得固定的資本！亦即早期的工業設備，所以對於新技術的成就和新發明的設施，反而祇能在比較有限的範圍以內來實行；因此，舊的固定資本反而堵塞住英國的工業發展，防礙了她對許多最新技術的廣泛利用。這種現象，我們在其他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內也能看到，但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德國，或在在大革命以後的蘇聯，却都以「迎頭趕上去」的姿態，迅速地完成其工業化了。因此，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經濟落後，反之，這倒可以使中國很自由地取法各先進國的最新技術，建設一個現代工業化的國家。

二 各種工業化的定性分析

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可能，我想已經沒有疑問了。但所謂中國工業化也者，究竟是採取各國已有的類型？還是應用科學中「一般的特殊」法則，根據

自己富強的需要，則創風格另闢新階呢？作者以為欲解決這一問題，第一步須先將現世界的工業化類型來個定性分析，然後再看各種類型是否亦能適用於中國。因為這件事所關非常重大，決不可單憑主觀的好惡或者臆測，輕易地予以答覆。現在先分析各種工業化的類型：

關於「工業化」這個名詞，在過去百餘年間，原用上並沒有甚麼歧義可討論的，但自「總理首創三民主義，並進一步手訂『實業計劃』，確立了民生主義的工業化以來，繼之一九二八年蘇俄又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提出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的口號，於是學術界就打破舊時因襲，常以下列種種工業化類型，相提並論於經濟領域了：

(甲)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類型 原來工業化事實之發生，最初是與資本主義的演進以俱來的。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是由商業資本發展為工業資本，因此工業資本主義的本身，便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東西。資本主義是以個人自由競爭為原則，所以工業化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亦不過為少數資本家的工具，借以增加其個人的經濟力量，進而支配大多數人之生活而已。然而這並不是工業化本身具有甚麼罪惡，反之，工業化是以充分應用機器為精義，所以它對現世界的物質文明，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無如它一向附屬於個人自由競爭，遂在資本主義的影響過程中，成為一個極重要的階梯。及後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工業化更成為少數金融大王所操持的傀儡，因而其本身成就愈大，與之俱來的聲譽也就愈多。我們應知工業化之足資詬病，正因為過去它和資本主義分不開的緣故。

(乙)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類型 現代的工業文明，畢竟是歷史進化的豐功偉績，而機器生產之大量應用，更是人類追求幸福過程中必不可缺的一項因素，因為只有機器才能使人類改造物質環境，確確實實的變成大自然的主宰；同時全民共享的美滿生活，必將在全民共有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以後，始有其可能。蘇俄在新經濟政策之中，固已顯然於共產主義之不能一戰而就，但即也深知要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創建鐵錐塊的堡壘，如果不加倍努力於工業化設備；即僅備國防而取經濟，也永不會脫離帝國主義的聯合封鎖，進而達到獨立自由的建國目的。因此所建建定其建設的第一個任務是工業化，而實行工業化原則即一本社會主義，而以一黨的領袖獨裁制，來計劃統

制着全民經濟。

(丙)殖民地的工業化類型 此外尚有所謂殖民地型的工業化者。它原是資本主義洪流中的一個小支，是在宗主國羽翼之下，所磨成而成的一種工業化運動。例如印度的棉紡織業，或荷屬東印度的石油工業；便是這種工業化的一個典型。關於殖民地工業化的特徵，約言之可有以下四種：第一，它必須配合宗主國的物資產銷，而以宗主國的利害為前提。第二，它在資本上要受帝國主義者的操縱支配，因為金融支配和資本輸出，乃是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經濟侵略的主要工具。第三，它在部門分配上要依宗主國的通盤計劃，借以養成宗主國所領導的集團經濟。第四，它必須只限於輕工業，重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因為重工業不但會變成民族獨立運動的武力基礎，而且機器輸入是宗主國操縱殖民地經濟的主要關鍵。至其所以肯讓殖民地輕工業化者，就是因為它本國的機器輸出可藉此增加，以期「失之京隅收之桑榆」。

四 工業化類型之選擇問題

我們明白了各種工業化的主要特徵，然後去選擇就有標準了。

記得有人曾公開主張：中國工業化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在資本主義已臨到風燭殘年的現在，其為不合理已至明顯，更不用說，中國能否造成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國家，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一、現在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正以全力互相合併，她們能談一個新穎的競爭對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分潤其利益嗎？第二、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的沈滯，已把厭惡資本主義的情緒相當提高，所以即使沒有外力的壓迫，國內民眾是不願意；第三、近代的社會革命既導源於資本主義，那末我們在建設大方向中，自應引為前車之鑒，如何能違反，總理預防社會革命的苦心，因引故犯而致蹈覆轍？

然則一聽列強的支聲，把中國引到殖民地的工業化路上，這却總是很可能吧。其實這也是機械的看法，形似可能實不可能。原來中國是在列強環伺下的一次殖民地，因之中國的經濟如不力求自主，便會繼續上各國對華的利害衝突，於是此國之所喜，一定是彼國之所惡，結果他們衝突的損失，都轉嫁在中國身上。「次殖民地」的好處，似乎有各帝國主義者的矛盾可以利

用，但也有一個絕大的壞處，就是如沒有自力表現，便沒有真正可靠的基礎，於是誰也難以『奮腳爪中取粟』，而誰腳爪却得不到半個粟子。須知在「總裁去發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前，中國沿着江海的各種工業，都多少帶一點殖民地工業化的氣息，其受外人之操縱壓迫，若與真正的殖民地比較，尚少自由迴旋之餘地。所以我們認清上述殖民地工業化的特徵以後，不僅對此要提高自己的覺悟，而且還要應極力加以排除。中國如果不能擺脫殖民地地位，固不但抗戰難於實行，即所謂建國也將毫無意義！

論者謂：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在蘇聯現已著有成效，中國爲什麼不效法它的方式，而愈趨愈直捷？其實一國的任何政策，決不能離開其建國的主義，而各國所賴以建國的主義，乃是先知先覺根據其時空環境的客觀環境，以超人的智慧所創造的產物。中國是以三民主義爲建國的最高原則，而民生主義之與共產現行的社會主義，無論怎樣解釋，也是有分別的，所以，我們在這裏不談蘇費。現在單就中國工業化說，也必自圖強徑，而不能完全取法蘇聯，試申論之：

(子)蘇聯無產階級革命之成功，是在第一次大戰末年各個帝國主義者打得筋疲力盡的時候，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之推進，又恰在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的期間。這是在時間上蘇聯所受的外力摧殘，其可能性小，所以社會主義的建設自然要比歐戰容易。中國的處境可就不同了，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其本身的力量已遠較一九一七年當時有長期增長，而且牠在「九一八」時，還深受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打擊，便乘著歐美的此種恐慌，向中國開始進攻，來摧殘我們經濟建設的統一基礎。仔細我們承認現代的交通已使國際的經濟日益密切之事實，就不難想像到這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們的國際經濟環境，不能容許我們建設一個以無產階級革命爲中心的經濟社會。

(丑)再以地理條件而論，蘇聯談話中國也是一個反共聯軍不易侵逼的國家。她沒有像中國這樣長而無防的海岸，敵人可以隨時隨處登陸，並且她在國境上的冰雪荒涼，更添增現代化的防禦工事。這一點是說中國的地理環境，使我們的施政方針不宜樹敵太多，而必須得道多助。

(寅)依照國際關係來看，過去沙俄是世界列強之一，她沒有不平等條

約的束縛，因此各資本主義者更沒有進攻蘇聯的種種特權。蘇聯作根據地爲佈置。但在中國，我們的國防是門戶開關，列強在華駐軍、內河航權，以及租界與領事裁判權等等，都給敵人捷徑以極大的便利。

(卯)最後拿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情況比較，沙俄自大彼得大帝改革新以後，早已步入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階段，中經克里米亞等戰役，歐俄部份的資本主義生產更加發展；她雖爲世界資本主義中最窮的一環，但其實當時的階級對立，卻已隨經濟發展而淡化，因此列寧發動爲中心的共產革命，就在各種條件下得以完成。至於沙俄時代的中亞及遠東各部固仍保留有封建的農業經濟中，而其土地所有權的極端集中，却是農民參加共產革命的有力條件。列寧就利用這個經濟上的畸形發展與矛盾，而完成他的以共產主義爲目標的革命。然而當他於一九二一年底正開始經濟建設的時候，鑒於事實的需要，遂不得不把戰時共產主義，按照環境而大加修正。至於我們中國，誰都曉得是一個殘廢生產落後的國家，而且土地分配雖沒有我們理想中的那樣平均，但土地制度，決非封建的性質；所以，從經濟的客觀環境說，我們實在沒有共產革命的必要與可能，因而我們就不能以蘇俄的革命方式，而從事工業化工作。

根據以上的討論，可知中國工業之路，既不可倒行逆施地採取資本主義的或殖民地型的類型，也不能效法攻擊軍裝仿蘇俄的類型。我們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型國家，因此中國的工業化也必須根據着民生主義，以實現我們適合國情的工業化的社會主義。至於民生主義的工業化之理論與實施，容留另文討論之。

德國在去年進攻法國的時候，曾限制每一國民每星期食肉量爲五百公分。佔領西歐各國後，突然增加到九百公分。這樣的情形，幾乎維持了一年。今年春對俄發動陸戰戰爭的前夕又從九百公分減到五百公分。單從這一點小統計看，就可以想像掠奪戰爭的性質，更可以說明希特勒統帥的一個動機。

農業機械化與農業革命

李曹航

一 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

十九世紀在人類生活史上所以特別值得重視，是由於這個時代產業革命的成功。這個革命的意義是人類利用機械從事生產事業，因而人類的生活，思想，社會組織，以及國與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在此革命狂潮中，只有機械化工業的高度發展，而佔生產主要部門的農業，却並未因機械發展而像工業一樣得有巨大的改革和進步。因此，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的產業革命，只能稱之為工業革命。

不過，在工業發展的歷程中，漸漸地有了農業機械化的趨勢，換言之，機械的應用漸漸地擴展到農業方面。考機械農業的展開，當首推美國。在一七九〇的時候，美國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從事農業，現在農業人口則已減到百分之二十，而對全國人民之食品供給則未嘗缺。這自然是機械代替人工及動力改變加大生產之故。然而美國農業的機械化還是漸進的。至於蘇聯則在幾個五年計劃中，便如「閃電戰」一樣，迅速的完成了農業機械化，不但原有農田增進了產品的質量，而且增加了多少番日認為不能墾殖的土地，和改變了農行的生活方式。這種巨大的變動，可以稱之為農業革命。

時至今日，我們不能只贊成或讚仰工業革命而漠視農業革命了。誰都知道蘇聯的幾度五年計劃是以工業化為中心，但斯他林却說：「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要創立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夠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不僅重新武裝和改造工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農業。」加列寧也說：「當着我們討論改良農業，採用集體耕作法，採用最新式機械這些問題時，馬上跟着來了一個問題，就是工業化問題。政府現有的工廠，發電所等，一看好像和農業沒有關係。但我們不要忘記，若從我們現在所有的農業設備，一畝地只有六七百磅的收穫，農民的状态是沒有改善可能的。我們無論如何，非將

農業設備改善不可。但像這樣的工業組織，怎麼能供給幾百萬農家的設備？這樣，除將工業革新，把它放在適合時代的技術基礎上，並大大的發展工業以外，別無辦法。」這不但說明了工業化是改良農業的先驅，而且確實的指出農業需要近代機械之迫切和必要。由此可見蘇聯在其計劃經濟的建設中，對於機械化是工農並重而無所軒輊的。

二 中國農業與機械生產

中國農業之應用機械生產，總理早在二十年前就遺囑昭示給我們了：「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力，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多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八倍。向來用人力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用機器生產，便可養八萬萬人。所以我們對於糧食生產的方法，如用機器來代人工，則中國現在有的許多荒田就能耕種，因為地勢太高沒有水灌溉，用機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開闢來耕種……」

然而，一談到把我們的農業機械化，似乎還有許多人在懷疑它的可能性。其懷疑之點不外下列數端，我們都不能不加以檢討：

1. 中國農業能否採用機械生產？

截至現時，社會上有許多人，甚至還有些學農的，仍相信中國農業是取進步的契約經營；認為這種經營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組織，一旦破壞了，中國農業就要整個解體，而新的建設却不一定有把握。因此，就有許多人錯把外國「大農」「小農」的爭鋒引用到中國農業上來，拿擁護小農的理論來替中國分解零割的農田作辯狀。其實，在歐西人士辯論中所指的小農田面積大約平均均在十六七英畝左右，這在中國是不可多見的大塊農田了。痛快一點說，中國農業經營的方式，久已根本不合於經濟原則；粗放和集約難都

要在經濟立場上適應農業環境以求得合理經營的名詞，但在中國已經用不上。中國農業雖擁有數千年的光榮歷史，但始終尚未脫離原始農業的本色。原始農業是：一靠天時，二靠人力；但人力有限，生聚無窮，再加以森林破壞，土壤流失，水旱天災愈演愈烈，而農田面積在遺產分變制度之下，又日趨零碎，以致合理的經營亦愈無實現的可能。農業對於自然的依賴性，及對於科學的拒絕性，都日益增加其程度，於是便造成了所謂農業「惡性循環」。我們要想打破此種惡性循環，惟一的方法就是農業機械化。

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數量是獨何級數的增加，而食糧則是算學級數的增加，人口增加若無相當限制，二十五年即可增加一倍；如以一對一的比例為起點，則兩世紀以後，人口與食糧便成爲二百五十六與九之比。馬爾薩斯的人口增加推算是否恰當姑不必論，但其對於食糧增加的估計却早已爲近世農業科學所打破了。農業科學促進農業增產的方法，第一是換用機器生產，第二是化學肥料，第三是改良水利。換用機器的另一意義，就是改變農

蘇聯農業機械化進度表(單位千輛)

年 份	拖 曳 機	翻 轉 機
一九三三	二一〇.九	二五.四
三四	二七六.四	三三.五
三五	三六〇.三	五〇.三
三六	四二二.七	八七.八
三七	四五四.五	一二八.八
三八	四八三.五	一五三.五
一九三八對	二二九.三	六〇四.三
一九一九之百分比		

這是試辦解決吃飯問題安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利器，也是蘇聯所以能以低價傾銷食糧取外國機器之唯一因素。現時我們想解決四萬萬人的吃飯問題，想平衡人口和糧食增加的差數，想在建國進程上奠定民生主義的基礎，亟求推動農業機械化先根本改造農業本身外，恐怕沒有其他更好的捷徑。

2. 勞力分配問題

一談到農業機械化，立刻有一個問題發生，就是勞力分配問題。本來中

業動力，以蒸汽力及電力代替人力，因此生產效能增加；而化學肥料及有計劃地改進水利，則非依附於機械生產的運用不可。因此，美國的農業人口在一百三十年間(一七九〇—一九四〇)自百分之九十減至百分之廿，但仍能供給全國糧食的需要，並未感到人口的壓迫。據美國農業科學專家的意見，若農民能運用其全部科學知識，則百分之五的農業人口，即可供全國之用。又如美國每英畝玉米，平均可產二十五蒲式爾，科學家認爲若充分利用化學肥料及科學地控制水利，則每英畝可增產至二百二十五蒲式爾。棉花、小麥、及其他重要農產，均有此同樣的可能性。故依此推計，僅加緊西達一卅之農產品，即可供給全國之糧食。

蘇聯五年計劃中工業化的內容，是把農業建立於工業基礎之上，而「重新武裝和改造農業」的，所以蘇聯對於農業機械化的進展來得更快。茲引下表以供參證。

內燃機及蒸汽機	打 穀 機	運 糧 汽 車
四八.〇	一一〇.三	二六.六
六〇.九	一一一.九	四〇.三
六九.一	一一〇.一	六三.七
七二.四	一一三.七	九六.二
七七.九	一二六.一	一四四.五
八三.八	一三〇.八	一九五.八
一〇八.七		七三六.七

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務農，一旦換用機器，省下來勞力自不在少數，這一項勞力會不會失業呢？如何分派呢？這是農業機械化後蘇聯所集中的一個論點。

其實在沿海交通便利的地方，中國農業勞力已於戰前嚴重不足。由於都市繁榮之吸引，由於農村生活之日趨下降，農村青年無一不感覺到煩悶，無一不想往都市跑。在山東膠濟鐵路一帶，農村日趨高邱，而且每

到春秋忙的時候常有來自黃河北岸而來的短工來補這個空。(可惜目前我見罷舉這個例。)事實上農作力既為個體的農具所限不能「盡其力」，而其所能盡的力又小到「盡其力」也沒有什麼較大的希望。所以「走向死路」的中國農業，不待細論階級知道，連蘇俄在田賦中的勞力者也已看透了。這在語口中國當有勞力人，或者可算是個提吧！

勞工失業問題，雖自上海戰後日趨嚴重，也是一班聚政者所預慮，但根本一句話，失業問題與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關係，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獨有的病症，而不是想民生主義所建設的國家所可有的現象。民生主義的目的在民生，一切生產權利，統以全民為對象，勞力可用於此，亦可移於彼。農業是解決吃飯問題的，所以它負着供給全體人吃飯的責任，但不必人人都要去做農業工作。同時，製造、鑿殖、開礦、交通、國防及其他一切有國民生的工作，都需要大量的勞力，而這些勞力都可自農業方面所剩餘的勞力供給之。中國如想於最短期間內，完成一個民生主義的近代化國家，必須抽調大部分勞力，以從事於工業化，完成民生與國防的需要。我們大部分的勞力都為農業所束縛，在農業方面若不換用機器，請問勞力從何處抽調？願農農業勞力因換用機器引起失業問題的人，實昧於中國國情，及不瞭解民生主義的意義。

3. 土地制度問題

分割零碎的土地，如何可以施用機器？我們所說的土地制度無疑地對於換用機器給予的限制很大。但是「平均地權」是實現民生主義的兩大政策之一，我們想建設民生主義的國家，改革土地制度是目前首要的工作。所以我們正不必因為土地問題的存在而對農業機械化懷疑。土地問題在政治上的意義較諸在農業技術方面的意義更大。輪到農學的頭上的問題只是究竟坐待土地問題解決後，再推動農業機械化，還是利用農業機械化之推動以促進土地制度之改革，或怎樣可使雙方並進而收互相為用之效而已。此點說來話長，當另文論之。

4. 資本問題

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另一問題便是資本。本來中國農業上最缺手的便是資困，因為貧困，所以一切改良農業的新法都不能引用。據蘇聯在五年計劃中

那種成千百萬的製造農業機器，是非有千百萬萬以上的資本是不能辦的。在民氣財盡的中國即便有志換用機器來改革農業，但連那筆鉅額資本那裏來？

依筆者所見，這筆資本，第一要由政府來負責籌劃；第二、資本的來源儘可遵照「總理利用外資的辦法」；第三、資本的又一來源，可在土地整理後由田賦中抽出一部分；第四、機器開始動用後可酌量徵收使用費俾便歸還此項資本；第五、農民使用機器後，可酌量提取增產額金俾便歸還，以成爲循環的農業資本。

蘇聯當日也很想利用外資，但因外交糾紛無法如願；乃先將收獲沙皇、僧院、白俄份子及其他大地主之土地，以爲農業改造之基金，次乃鼓勵生產，競賽並利用農積，以成爲大量的資本。中國雖無大量土地可收沒——其實漢好的土地可照例收沒，但數量恐亦微小而不能有大的作用——然外資可以借到，這已優於蘇聯一等。土地整理後田賦必增加，從中酌取少數以改進農業，也是一個合理的辦法。農民使用機器之後，酌抽使用費以便歸還資本，亦無不合。提取增產額金以爲資本之農積是蘇聯在五年計劃中最有效的理財方式，很值得仿效。積極發動全國人力提倡生產競賽，是蘇俄兩國建國的主要方式，而工作競賽已屢見。總或詞詞及論文之中。中國農業在工具方面加以改良，在生產而積方面予以擊殖擴大，加以中國勞力之衆，人民之勤苦，其成就是不可以限量的。資本方面應由政府擔任籌劃，不僅是因爲農民窮困，而且因爲發動這樣偉大的事業，非由政府統籌不可。至於農器的供應和使用，竊以爲仍應以實行筆者所提議的「農業公用制」的辦法爲妥善。(參看本利第一卷二十四期拙著「建立農業公用制度論」)

「農業公用制度」的意義，是使用「供應」和「使用」有一個合理的辦法。即一切農業生產手段由政府擔任供應，而人民對於生產手段的供應，則爲合作公用法。這樣(1)農業改進工作可在政府統一計劃之下施行；(2)政府與人民可能聯爲一個整體；(3)政府可藉供應以組織農民；(4)政府可由供應以改進農業的經營及土地的使用；(5)治對於資本之籌集及機器之置備可因公用制度而確定其計劃及數量；(6)農業機械化之進行不以人民的貧困而被阻止。

(三) 中國農業機械化之變革革命性

中國現時土地制度是推行農業機械化的一大障礙。但自另一方面言，農業機械化之推動和展開即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所以農業機械化在生產技術和土地制度兩方面就含有變革的革命性。

變革革命性的意義，由前言之，是增進生產，改變農業經營的方式，其根據是農業科學；由後言之，是合理分配及改變人與地的關係，其根據是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和農業科學二者便是農業革命的源泉。農業機械化一經實現，其結果不僅是農產品因為生產與經營方法之改變而改變，而且生產者與經營者因機械化而生的變革，尤為重大。

在蘇聯，與農業機械化平行進行相互為用的一種新農業制度，都知道是集體農場。集體農場的意義固然在實現所謂布爾什維克的理想的農民生活。但在這農業生產與經營方法之進展以及切合機械農業社會之人民生活上，集體農場亦有其影響。至如美國和加拿大的農民，雖不因機械發展的驟強而實現集體生產，但農民之福利與生活，實亦因機械發展之故而相對的改變。這是機械化本身帶來的一種自然結果。我們自然不以僅僅得到這種自然結果為止；但我們也並不一定去做集體農場，因為我們所奉行的是民生主義。

產業革命中之社會變動

李素華

我們雖然不能同意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只以生產方法（即資本，勞力與技術三者配合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演變解釋社會各種制度與組織的變遷；我們雖然也不能同意泰勒（Taylor）的技術觀，專以生產技術的變革作為社會演化的動力，然而我們却不能否認生產的方法與技術是社會生活的重要因素，它們的演進逐漸地對於社會的變動發生很深刻的影響。這是人類社會經濟史上一個很顯明的事實。

根據民生主義的暗示，我們在經濟建設的歷程中不僅要工業機械化，而且也要農業機械化；實言之，我們今後要在經濟建設的歷程中完成我們的產業革命，藉以增加生產，厚裕民生，實現了總理的民生主義。我這裏所願

民生主義兩大基石之一是「平均地權」，其目的是「耕者有其田」。所以總理說：「農民問題的真正解決是耕者有其田」，又說「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切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給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國家納稅，另外沒有地主來收租，這是一種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澈底的革命。」

至於如何實現平均地權，總理則很明顯的指出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而「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澈底的革命」一語，也說明了土地革命的目標。如果農業機器像工業機械一樣，變成地主的剝削利器，那便違背了總理提倡農業機械化的原意了。所以農業機械化的實現，首要和土地分配問題配合着進行，而在用政治法律來解決土地問題，和開始使用農業機械以外，耕田面積的狹小問題也可同時予以順利的解決。以耕者的抽稅，於此之外，更應利用「農業公用制度」，以擴大供應與合作，補助農民合作共營，以實現一種理想的民生主義的合作農場，或稱稱為民生農場。

民生農場的內容，是民生主義的新農村社會，是科學化機械化的農業，其土地是歸耕者均有而僅向國家納稅及合伴公營而各盡其能各取其值。這樣，農業機械化在農業革命過程中始能完成其合理的任務。

加以展望的是：我們的社會生活及組織在產業革命的歷程中將要發生什麼變動，變動之後，有沒有什麼危險。

在產業革命的歷程中，我們的社會將要發生下列幾種的變動：
一、都市的發展。這是任何社會工業化的必然結果。我們過去的都市差不多都是因軍事政治的原因而形成的，其中的人民除了政府的官更外，雖也有些巨商大賈及販夫走卒，但多都是經營一種田園生活，充滿着農村色彩，所以我們過去的都市與其說是社會的經濟中心，不如說是政治中心，它對我們歷代的經濟機構，並未發生過驚人的影響。自列強經濟侵略以來，沿海各省雖發展了幾個可以稱之為經濟中心的都市，但經濟勢力多操於外人之手

，反成了榨取我們汗汗的根株地，在經濟生活上構成一種病態的畸形發展。可是到我們依着「總理的民生主義及實業計劃從事工業化的時候所興起的都市，便要與過去和現在的不同其性質了。它們的地位所在地必然要以我們的天然富源為依歸，說不定今日的曠野，將來都有變為通都大邑的可能。它們不是消極的消費場合，而是積極的生產中心，因而它們經濟活動的目標不在資本的榨取與集中，而在經濟物資的增加與調劑。

二、人口的集中。這在任何社會工業化後都市發展的必然現象。例如工業化達到高度的英德兩國，其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都集中於都市；就是工業化程度尚低的法比兩國，也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集中於都市。我們中國的人口現在富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還在農村社會，不過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且將隨着工業的發展與都市的勃興，必然也要逐漸地集中於都市。因為都市的各種機會多，交易易，不獨農村的剩餘勞工願到都市裏求生活之道，就是年富力強聰明才智之士也都情願到都市裏謀發展之方，所以將來興起的新都市不但要成為經濟發展的樞紐，而且也要變為文化推進的關鍵。

三、農村自給經濟的解體。歐洲各國的都市發展會促成了莊園經濟的崩潰；我們因工業化而興起的都市也必然促成了農村自給經濟的解體。因為將來由工業發展所興起的都市，將變成周圍農產品的固定市場；而農民也就根據都市的需要，從事某種農產品的種植，以供給都市的市場。換言之，工業的發展及都市的繁榮使各種的農產品都可變成市場上的商品，因此從事農業的目的將不在供給自己的衣食需要，而在供給都市的市場需求。在此種供求趨勢之下，農村的農工既不以自給為生產的目的，則自給自給的農村經濟自然就不易繼續存在了。農村自給經濟解體之勢，代之而起的將是一種區域農產專門化的農業經濟。這種農業經濟在歐美工業國家都是顯著的事實；我們的農業經濟將來也必然要向着這個方向邁進。因為我們根據天然富源的分佈所規定的某種工業區及在某種工業區所勃興的都市，必然大量地需要某種特殊的農產品，而務農者就可依據這種市場的大量需要，大規模地從事某種特殊的農產品的生產，於是乎農業的生產便要隨着工業與都市的發展而逐漸地專門化了。我個人認為惟有到農業生產走上這專門化的階段，農業的技術始有機械化以便大規模生產的必要與可能，而不致發生所謂一般農

傷農的危險。

這裏應當指明的是：只有農村自給經濟解體而走到農產專門化的時候，都市的工業製造品始能在農村裏尋到固定的市場；都市與農村始能變為相互繁榮的因素；因而整個社會的經濟機構始能像身體的血脈體系一樣發生一種相依為命的密切關係。也只有社會的經濟關係達到這樣密切的程度，我們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結始能臻於極堅強鞏固的地步。

四、家庭制度的變革。我們的家庭制度是以家長為中心的大宗族制度，是以儒家宗法觀念為背景以農村自給經濟為基礎的家庭制度。因為西洋倫理思想的傳入，這種家庭的制度現在已經有了破壞的趨勢。等到農村自給經濟解體與都市勃興的時候，農村的大部份人民都紛紛愛背井離鄉，在都市中謀生活及發展的機會，結果是：父子兄弟天各一方，骨肉手足之情雖仍存在，但因職業的束縛，經濟的獨立，及生活習慣的不同，復難再像已往的家庭可以時時地享受天倫團聚之樂。因此，雖然父子兄弟關係的大家庭制度便要逐漸地衰微而成為小家庭制度。這恐怕是將來經濟組織改變必然發生的一種結果。

年來有一派鄉村建設論者，鑒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使我們的農村經濟日趨凋敝，農村組織日趨式微，動搖了舊有的家庭制度，破壞了舊有的倫理道德，乃不遺餘力地推動農村復興的運動。這種運動在我們工業建設尚未展開之前，為着安定社會，當不失為一時便宜之計；若欲使此二者永久作為我們的社會基礎，而不忍其稍有變更，則不免忽視了我們的社會動向。要知道我們為着時代的要求必須工業化；工業化的結果必然是都市發展及農產專門化；而都市發展及農產專門化的結果則又必然地破壞了農村自給經濟，而以農村自給經濟為基礎的大宗族制度，在這個經濟變動的歷程中，自然也就無法存在了。

五、文化的溝通。我們的禮教，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及思想觀念，因歷史的遷移歐化，大體上說來，在過去到處是一致的，而構成一個文化的整體。可是自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我們的文化便分為都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趨勢。我們現在的都市已成了吸收西洋文化的中心，而都市的居民因為耳濡目染了西洋文化，在禮教，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及思想觀念各方面，都

起了質的變化，遂慢慢地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至於居住在農村的人民，終年過着自足自給的農耕生活，他們底經濟與社交的活動都出了農村的範圍，很少和都市發生經濟的或社交的關係；而由農村到都市來受教育的少數青年，完成了他們的受教育之後，則又往往樂意留在都市中謀生活而不肯回到故鄉去。因此，都市文化很難向農村傳播，而農村的禮教，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及思想觀念依然保持着原來的狀態，沒有什麼質的變化。如果這種情形延續下去，我們的社會勢將有都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存在。這是一個極危險的現象，這種的社會問題都可以因此而層出不窮，致陷社會於分崩離析之境。

不過這種情形是不會延續下去的。當我們遵照着 總理的民生主義及實業計劃而向工業化邁進的時期，農村自給經濟的藩籬就被衝破了，農村社會的孤立與狀態漸漸消滅了，都市與農村間的經濟關係及社交關係都逐日加緊繁和密切了。因此都市的文化也可以隨着這種關係而自然地傳播到農村去，使農村的傳統文化發生變化而與都市的文化溝通起來。所以工業化和都市發展之後，我們的文化就可以成一個調諧的整體，而不至再像現在有都市與農村的區別了。

我們根據以上的展覽，可以總起來說，產業革命的結果將促進都市的發展；而都市的發展一方面使農村經濟及大家庭制度崩潰，另一方面則獨立都市經濟的綱維以加強整個經濟活動的聯繫，同時溝通都市與農村的文化以形成一個新的文化基礎。因此，我們的社會將由靜而動的狀態變到動的狀態，削弱了我們的鄉土觀念及家族意識，同時也增強了我們的國家觀念及民族意識。

然而產業革命都市發展之後，我們的社會究竟會有沒有像許多歐美學者對他們工業社會所憂慮到的危機呢？這也是我們應當加以討論的問題。

歐美有些學者認為都市的發展有下列三種的危機：

一是生育低落的危機。例如德國的 C. Lorenz 和意國的 C. Pitt, 都曾根據都市人口的統計，相信都市居民的生育率比而死亡率高，其所以能維持人口的平衡，完全是由於農村人口的不斷移殖；否則兩世代之後，都市的嬰兒人口的減少而歸於沒落了。且近代都市日益發展，而農村亦漸有都市化之趨勢，密此以往，任何民族都將有趨於滅亡的危險。

其實，這是危言聳聽不事實的一種言論。第一點我們要知道的，在十八七世紀的時候，歐洲的都市，例如倫敦，曾有過死亡率高於生育率的現象，似乎都市的生活不宜於人口之繁殖；但自十九世紀以後，都市的衛生設備日趨完善，其生育率每年都高於死亡率，而其嬰兒死亡率則比農村的嬰兒死亡率低了很多。第二點我們要知道的，近代都市的生育率，一般說來，誠然是低於農村的生育率；但這並不是由都市人民的生殖力弱於農村的人民，而是由於他們願意維持或提高生活標準，不得不採行生育節制以減輕家庭負擔之所致。這是一人為的一種現象，國家可以獎勵生殖之政策遏抑之。第三點我們要知道的，都市如果沒有農村人民的移殖，誠然不易發展，然而農村的人民，如果沒有都市供給他們種種的經濟機會，恐怕要感到人口壓迫而不能常常地維持高度的生育率。歐美各國自產業革命之後，其人口所以能增加若干倍者，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明乎此，我們就可不必憂慮我們產業革命都市發展後的人口問題了。二是極端必衰的危機。例如德國學哲斯朋格耳認為都市的發展與繁榮，雖是文明發達的必然結果，但同時也是文明沒落的象徵。由他看來，都市的生活誠然充分地發揮了人類的理智，但同時也充分地摧殘了人類的本能；它的人為現象違反了農耕生活的樞樞精神；它的緊張空氣放棄了農村生活的自然調和；它的生活方式破壞了血族家庭與民族的團結；它的競爭行為養成了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理智主義及大同主義等等的分化態度，而這些態度所表現於外的結果，就是生育能力的衰微及民族生存意志的沮喪。因此，他斷定一個社會的都市若發展到預點的時候，也就是這個社會生命的衰頹將要來臨的時候。

很顯然地這是把人參天的一種觀察。我們證諸西洋近代史，就可以知道歐洲工業革命都市發展的國家，都因為人口的繁殖而向外擴充殖民地，而其人民的民族意識則又隨着國家向外發展而日益高漲；我們實在看到不他們有生育能力衰微及民族生存意志沮喪的象徵。至於因競爭而產生的社會運動與主義，則由於經濟組織的內在矛盾，而可以自治的力量消除之，決不能因此而斷定其有極端必衰的歸宿。須知社會和個人不同，它富有適應的能力，絕不受由幼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衰的生物學之支配，到了某種階段就必

喜慶的。

我們只要根據 總理的民生主義從事經濟建設，則都市發展後，絕不會像歐洲各國發生種種的社會病態，所以我們也不必憂慮有這種危機。

三是固有文化遭到的危機。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T. S. Brown 就認為都市記憶力不強，其知時而趨新奇；而農村則重傳統，尊奉祖先所遺留的風俗習慣。因此，他相信都市雖是文化的創造者，但也是異民族文化傳播的媒介和固有文化的破壞者；固有文化一遭破壞，則民族國家的統一也難以保持，例如古代希臘羅馬之滅亡，便都是都市發展異民族文化侵入的結果。至於純粹的農村社會，最易保持文化的完整，縱被異民族統治，固有文化仍能保全無恙，一旦時機到來，就不難恢復民族的獨立。

無疑地，這更是一種危險。都市雖然有傳播外來文化破壞固有文化的作用，但這不必然地產生一種危險。我們的理由有四：(一)兩種文化的交流，乃是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外來文化的侵洩而故步自封，則要呈現停滯的狀態而不易向上發展。所以都市傳播外來文化，正是一種貢獻。(二)兩種文化之誰優誰劣，雖是一個主觀問題，但一經接觸比較，畢竟有個客觀的優劣標準，含有一個優勝劣敗的淘汰歷程。所以都市的人民儘

管是趨時尚趨新奇，但他們對於外來文化絕不會盲目接受，對於固有文化也絕不會隨便厭棄，而毫不比較選擇的。(三)外來文化的傳入雖有損於固有文化的完整，引起社會的一時紊亂，但這是必不可免的犧牲。經過相當時間的適應與調整，就可產生一種新的文化，而紊亂的現象也自然消滅了。(四)純粹的農村社會誠然可以保持固有文化的完整，但在古代律律為遊牧民族所侵略，在現代則往往受工業發達的民族所支配，而不易維持或恢復民族的獨立；這是城一般的史事。至於古代希臘羅馬之所以衰亡，原因至為複雜，決不是由於都市發展異民族文化侵入之所致，稍讀西洋古代史者皆知之，實無辯駁之必要。

根據上述四種理由，我們相信我們產業革命都市發展之後，不僅西洋文化之傳入不是壞的現象，就是固有文化也不會有完全沒落的危機。我們仍惟一問題在如何取舍西洋的文化，如何去留固有的文化，以便適合我們的需要。

總起來說：我們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種種社會變動，都有益於民族的前途，毫無任何的危機。惟反抗之後，及早完成我們的產業革命。

青年論壇

國父關於勞工問題的遺教

陳定閔

歐美的勞工問題是由於實業革命以後以機器代

人工致有失業及其沒落的現象，甚而由於分配不均致使有資本家剝削勞工的現象而發生的。國父在

三十年前向社會黨人演說時即有過透切的分析。但是中國勞工問題的起因則不同，因為「我國未經實業革命」，我們的勞工問題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所致。 國父謂：

「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

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為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現與帝國主義相勾

結，而資產階級亦脫然紛起而分其餘孽。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趨憔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國父又深一層的說：

「我們本國資本家，實在沒有壓迫工人的大能力。現在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於外國的經濟壓迫」。(民國十三年勞動紀念日對各工團演說詞)

中國的勞工問題既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那末中國的勞工問題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國勞工

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產生種種現象，一是中國的工人並沒有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反而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國父說：

「中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不同的地方，是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如果有外國資本家來壓迫，政府也是想方法來保護。……至於中國的實業，還沒有發達，機器生產，還沒有盛行，所以中國沒有像外國一樣的大資本家，外國有了機器生產之後，發生了大資本家，一般工人便受資本家的大害。中國工人現在還不受資本家的害，本國還沒有大資本家來壓迫工人。……中國工人是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故外國工人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中國工人恰相反，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是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這就是中外工人不同的情形。」（全前）

另外一種現象是工人因經濟壓迫上而將受損失。「中國每有五六萬多的損失，就是中國對於外國，每年有五六萬的進貢。中國工人本來不直接做外國人的工，不受直接的虐待，但是因為通商，多銷洋貨，每年的進貢，有了五六萬元，就是中國工人每年要受損失五六萬的工錢。」（全上）「中國在表面上雖是獨立國，實在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因為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受了外國這樣大的經濟壓迫，所以中國工人便發生痛苦」。所以國父又說：「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中國工人要受外國經濟壓迫，間接做外國資本家的奴隸」（全上）這可以說是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造成中

國勞工問題的特殊現象。所以我們也可以探知中國勞工問題不但是經濟的問題而且是民族的問題。故國父說：「勞動界有無民族主義則依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宣言）這是中國勞工問題的一個性質。

中國勞工問題不但是個民族的問題同時也是個政治的問題。「外國工人在文明國家，政府有完備的法律，來保護工人，所以都不要工人來擔憂，因為政府有保護工人的法律，所以工人的地位很高，就是生存在不文明的國家，工人自己也能組合團體，提高自己的地位」。（民國十三年勞工紀念日對各工團演說詞）而「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中國政府不但是不保護中國工人，並且反去保護外國的貨物；直接保護外國的貨物，就是保護外國的資本家」。所以國父以為「中國工人不只是反對本國的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價，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全上）此外，中國勞工問題還有一點與各國不同的，就是中國的貧富並不懸殊。國父謂：

「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富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頂大的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以說是大貧。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祇有大貧小貧的分別。」

（民生主義第二講）

中國既貧富懸殊，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衝突也不如歐美之利害。這是由於中國私人資本的工業不發達。因此，中國勞工運動的方式也就不能效法歐美的。所以國父說：

「我們廣東的工人，從前沒有團體，近來因為知道了被東家壓制，便組織種種工會，去反抗他們，遇到和東家衝突的時候，便罷工，要求加工價，減時間，這種方法是從外國傳來的，外國的工人要求加工價，是因為他們工業發達，工廠極大。普通一個工廠，一年可以得幾百萬利息。像上海前幾年的工廠，一百萬資本，每年可得洋兩三百萬利息，外國像這大的工廠，每年也可以得幾十萬利息。外國工人因為生活太高，便團結起來，和廠主商量只許廠主賺若干，有餘都要分到工人。這情形實傳到中國來，我們的工人，不管工業的情形怎樣壞，也是一樣照行，不知道中國沒有極大的工廠，只有做散工的勞動。他們還要求加工價，所以百物昂貴，米也隨之而貴。……要補救他，要甚麼方法呢？歐美補救方法在資本家的一方面，是工價加高，貨價也抬高，這不是根本的解決，他們現在所想的根本解決是社會革命的解決，中國工業還沒有發達，罷工的事，在外國可行，在中國不可行」。（革命成功全賴主義宣傳

文字的力量

當我們想到數千年來中華文化的燦爛昌明，更覺我們想到現在正處於國運將興，另一期新高文化正發動與開始的時代，我們不能不激昂地興奮，感覺到新鮮的活力的情緒。文字是一切文化的基石。她記錄了古代聖賢的遺教遺理，後輩者的偉業模範，今人為進高理想而奮鬥。自古言讀造字起，春秋時詩書之學傳，於是一代代的文章典籍相繼而後代。輸入人們智慧的血脈中，形成了中華兒女最寶貴的遺產，為民族的獨立生存加上一重永久的保證。真的，文字是有力的。她可以溝通人與人間思想的脈絡，接連着時代中間的距離，喚回了過去的人生經驗，似幻燈一般映演出歷史的劇幕。在今日，除了變夷外，很少沒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了。

文字的功用很簡單，她讓人們彼此知道。用字與寫字的能力，是人們特有的稟賦，人與獸間最大的區別。據說，貓也有一個廣大的有意義的語彙，也許還很潤澤的呢，可是那誰也不知道。但貓的迷迭的言語說完後就同時消滅了。唯有人類能記載自己的過去。在短促的生命歷程中，我們似乎懷抱一種熱望要保存我們所看見的，思慮的，感覺的，與知道的一切。有些是事實，有些僅是幻想——好聽後人認識我們所居住的那個世界，是我們所成就的。是什麼？就是這推動使作家寫述着，從上古的佚名詩人至最近的小說家都是如此。她好像隱藏在人們的性情內。

柳無忌

文字，記錄下的思想，不祇是一把劍，可以斬除惡魔，或一聲號角，可以驚醒昏迷者，她也是一條把我們連繫於全人類的鎖鏈。當我們失却了對於過去偉大文字的接觸，當舊文字好似沒有意義，而我們自己又不能造出新字來適用於我們的時代，於是歷史要改變了。『及有一個人是一座島，可以與世隔離；每個人是大陸的一部份。倘使一塊泥土被海水沖掉，歐洲就喪失了這塊土……；任何人的死對我是一種損失，因為我屬於人類集團。所以當我哀鳴着哀悼，你不用打聽是為誰，這是為你嗚着的。』這是英國十七世紀一位作家的名句，她是復新穎的，有如昨日寫出，可以放在本年內任何小說的封面後頁，當作題詞的。是的，文字有力，她活着，也可復活着。

文字不但生存着，而且經過了時間與變遷，也許會獲得新的意義及重要性，替前人寫作時所夢想的。譬如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公民』一句簡單的話，這是事實的述說，而此事實早為大眾所公認，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我們聽得極熟了，連講也不去講他，不要說為他思想了。好像我們同人家講話時忽然說着，『我是一個哺乳動物』，同樣的冒昧得惹人發難。但是當我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時，這裏邊實含有深刻的意義，為我們在字面上所看不到的。倘使我是『公民』，我就不是奴隸，也不是貴族，所以不能是古代或中古世紀的人。

我有對於國家的義務，國家對於我有責任。那種觀念不是昔日的聖賢豪傑或朝臣士子所能瞭解的。『公民』這兩個字，代表人們腦筋中一個好夢的實現，這夢說她古，原是幾千年來哲學家的幻想，說她新，却只是今日的事情，也許要留待明日始能全部完成。這夢曾被蹂躪着，消滅在歷史上的黑暗時期；她也不斷地重現着，像綠草在初春時的滋長。對於我們，這是一個切身的夢，而夢的行身就包括在簡單的兩個字裏。

此句的其餘四字，『中華民國』，更是三四歲的孩子都知道，曾用天真的小嘴重複地述說着。但是我們真的知道嗎？我們知道這些字的來源嗎？中華民族為爭取獨立自由與殘暴的異族苦鬥的史蹟嗎？曾經想到否在三十年前的今日，人們對於『民國』有如何感想；英雄志士在挫折後如何重新努力，或日失望中又激發起新的興奮；有多少平民的犧牲，烈士的鮮血，鑄造了『民國』的初創；復經歷若干年的艱苦奮鬥，瀟灑的戰爭烽火，始奠定了『民國』的基礎？今日，在神聖的民族抗戰中，又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蹟，使句中的每個字更顯得親愛，也特別偉大；我們不祇是想到一幅地圖，與青天白日的國旗；我們更進而思及一個活動的理想，一種觀念，堅強地留在人們的腦中。這思想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的子孫更習慣了，但會有一個時候，人們仍生於她的爭鬥與崇拜中；而現在，人們仍生於她的爭鬥與崇拜中。當這句話說出的時候覺得很平淡，但是文字裏所蘊藏的深意永遠存在那裏，不過倘使不點破，我們是不覺得體了。

所以用字要小心翼翼，要經過慎重的考慮。有

個人所寫下的，在當時祇被認為不過是文稿的一節，在某種巧妙的場合內發生，但事後却留傳下去，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幾個同志，覺著地來臺北平某醫院的一間小室內，侍候着一位曾「致力於革命凡四十餘年」但俄頃即將離開世間的領袖，他在臨終時口述他未完成的使命，他對於其他同志的期望。這一段話簡短地被筆錄下來。這似乎是一件偶然的事故。但是，不，這是歷史上一件重要的文獻，則時代的偉大記錄，因為這是中華民國國父的「遺囑」。每一字，每一句，在過去今日與將來，將永久地打動人們的心靈，引起激烈的震動。這整個國策的最高指導，每個國民應遵循的方針目標，萬世不磨的偉大名言。只要文字與國家生存着，她也永久地存在。從另一方面講，好文字原有好的影響，但是壞文字也有破壞的影響，所以寫作時更應費心斟酌。我們不能草率從事，滿不在乎地記錄下我們的片言隻語，因為我們不知道也會遺留下什麼印像。有時，不審慎的文字會照臨天下蒼生呢！

文字固然要謹慎，但也得大膽。勇敢有力的文字始能存在。在當時，「遺囑」的內容就是一種有毅力遠見表現；今日我們誦讀時尚可追憶，那種體現在文字裏面固無大畏精神，感受着興奮與鼓勵。有些古代的文字不自覺地變為我們思想潮流的部份，我們多年來受着牠們的薰陶，因為太熟習，反而不覺其好處；但是們使我們願意的話，我們總可以重新發現我們的力量。再舉一個外國的例子。最近英美的聯合宣言也是一種結實的文字，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表現之意志

，所同意之領土變更，兩國不願見其實現。」在歐戰後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以前，此等國家或會侵略或可能威脅侵略之國家」之解除軍備實為重要。「這些是雄壯的句子，精警有力，字字如斬釘截鐵。因此，一個國家如要獨立生存，一種精神如須流傳後世，不能長久地忍受着委曲敷衍，沒有精彩的文字。後者如政治一樣，不許接受妥協或姑息。我們在過去有勇敢的人，在將來也要勇敢的人。唯有這些字能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世界。

但文字有時要被扭曲，曲解，塗鴉。由於這種誤會他不能一定達到原作者的用意或希望。一個藝術家囑盡心血要創造出一件美麗的事物，結果呢，他發覺了，懊喪地，他們創造的祇是一個四不像的東西，也許是三頭六臂的妖孽。文學家忠實地描寫生活的片段，因為過於寫實，反被一般人視為不道德。作家們誇耀自己的職業，但他們也不時自卑自棄，任何人都知道這文字並不全是萬能的。甚至於美麗的文字會被強暴者所凌辱，失去了她的貞潔。譬如「新秩序」，「共榮圈」，「生存的空間」，「歷史的語言」，以及那個最微弱的呼聲「未來的波浪」，都是盡善盡美的字句，但不幸為讀者引用作他們侵略的詞毒，因此蒙受了污濁。然而真理終究要被實現的詞毒，因此蒙受了污濁。然而真理終究要被實現的詞毒，因此蒙受了污濁。然而真理終究要被實現的詞毒，因此蒙受了污濁。

波及了遠遠的岸。些微的波動或許在來日產生一定的效果。因此作家並不灰心，一直在積蓄地表現生活，想像理想的人生。他們不過如蠅垂名在時間的記錄簿上，可是他們中間祇有少數讀美暴力，更少數憤恨人類；大多數都痛斥着罪惡與黑暗。在過去的幾年中，一股侵略的惡勢力從地獄中掀起，威脅了自由的國家，吞滅了自由的領土，麻醉了人們的腦筋，束縛了他們的意志，這種罪行人類在以前尚沒有遭過。暴力所經過的地方，藝術破產。但就是專制者也恐懼文字的力量。他們不許人民參與自由的書籍與言語，他們甚至禁止耳語運動，或如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或如希特勒那樣驅逐文人於國土之外！因為後者不願喪失天良，拋棄每個藝術家所有的天生權利，思想與言論的自由。這表示文字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會使暴君為之悚然不安，欲除之如眼中釘；另一方面她也告訴我們，這衰頹是為誰為着。所以我們那些尚有自由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什麼是我們應該說的話，這話又當如何說法；我們應如何利用文字的力量，使她成為光明自由的傳播者。

今日的世界大戰是武器的戰爭，她亦是思想與文字的戰爭。在納粹及其夥伴的統治下，藝術家的自由有如個人的思想自由同被剝奪奪盡了。每個作家都應有與暴力搏鬥的決心。我們可以喚起古代偉大人物的偉大語言，來為我們作後盾。這是我們應該做的，當我們同意過去，看見他們如何以極大的忍耐與堅毅，及如何勇敢地以犧牲自我的代價，獲得了我們所承繼的這遺產。可是這遺產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們要新的文字，也是偉大的文字，以配合我們

代的需求，爲未來指示一線光芒。這是重大的工作，而且是艱鉅的工作。我們不知道什麼人可以創造這些字。他們不是庸俗的世俗者或投機者所能發明的。但倘使我們相信自由，也相信生活，這些新文字一定有一天會替創造出來的。

短評

應從政府官吏努力起

現在敵人雖已精疲力竭了，國際形勢雖已日見有利了。當此勝利在望建國發軔之時，全國同胞必都興奮而奮發地願意進從。委員長本年雙十節告全國軍民書中的語句，各盡天職，來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偉業。

在大家分途奮進之中，我們特別希望政府的官吏要首先振發努力，因爲國家當前的一切問題都要以中治爲轉移。

我們相信，全國將士都必願遵照 委員長的號召，更能「奮其英武，攻賊淫孽，造成光榮戰績，以盡我中國在反侵略陣營中之責任」；但政府官吏如仍有腐敗因循的現象，則前方瀕瀕血拚，後方玩弄稱時，將何以振奮士氣，安慰遺孤？

我們相信，全國人民必都願遵照 委員長的號召，更能「茹苦忍烈，犧牲個人，貢獻國家」；但政府官吏如仍有怠忽職務，以私害公的現象，則抗戰力量，無所充實，建國速度，亦必遲延，又如何能激發民心，趕上時代？

今日的作家應當講文字的力量，慎重地却也要敢地爲人們爭取自由，與黑暗戰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字，我們需要新的文字，以表揚在抗戰後新中國的文化。我們將邁進着，沿着光明的大道前進，負起這巨大的責任，不容有毫釐的疏忽。

自封的現象，上不能嚴厲爭論，下不能嚴潔舉公，則粉飾思想，何由糾正，全國意志與力量，更如何能切實的集中？

我們更相信，全黨同志都必願遵照 委員長的號召，更能「許身革命，有進無退。冒險犯難，義無容辭……以求三民主義革命建國之成功」；但政府官吏如仍有自暴自棄，陽奉陰違的現象，則國人責難，振振有詞，因之三民主義不易宣傳，民衆訓練不易着手，革命建國不易順利進行，國父的遺志遺業，又如何能如期完成？

根據此種認識，我們相信一切問題都須先從整飭吏治開始，所以特別希望政府官吏要體認 委員長訓示的苦心，首先振發努力，與民更始，以奠革命建國之基。

蘇聯的危機不在西歐而在遠東

在遠東

自從德軍發動兩路進攻莫斯科，蘇聯的戰局突然吃緊。無論戰運怎樣演進，我們認爲蘇聯的勝負，不祇決定全歐大局。真正決定大局的關鍵，要看英蘇能否即時裁制日本，解除蘇聯遠東的威脅。

德軍的憤憤，在包圍敵人的主力。在波蘭作戰是如此，在法國作戰尤其如此。但是在蘇聯却未必能奏效。第一、蘇聯的主力始終沒有集中。第二、蘇聯的國土遼闊，包圍圍不容易造成。第三、蘇聯經過三個月大的戰鬥，全國的經濟設備已經完備，敵人必須以重大的代價，爭取尺寸的土地。以無限的國土消解有價的代價，不怕不犧牲任何敵人。蘇聯既不會變借一兩據點而虛耗主力，更不會犧牲已經到了這個程度而中途氣餒。等到寒冬來臨，在冰天雪地的戰場上，希特勒的夢想就要粉碎了。

然而前面的敵人是看見的，後面的兇手却是防不勝防。今天蘇聯不受到優勢德軍的壓迫了，還談不到什麼失敗，而日本已經摩拳擦掌，隨時試。甚至在報上放出空氣，強調地理地說，英美日在南太平洋並不在北太平洋，以試探英美輿論的反響。英美此時如果還不認清日本的真面目，即時裁制蘇聯背後的強盜，不特動不起蘇聯，而且太對不起自己了。

希望於黨政考察團者

滇黔，西北，川康三區黨政考察團，有的已經出發，有的不日成行，其任務不外考察各省黨政設施的實際情形，以爲中央將來擬訂方針的參考。要達此任務，我們就不能不希望各考察團注意三點：一、不惟考察各省黨政工作之成績，尤要發現黨政工作推進之困難所在；二、不惟要明瞭各省黨政工作之計劃，尤要洞悉其目的進展之實況；三、不惟要對各省黨政現有工作與以嚴格的批評，尤要與以同情的指導。

如此，各省黨政當局始能開誠相見而不僞造報告，虛心受教而不文過飾非；亦惟有如此，考察團始能搜集到真實可靠的報告資料，以供中央參考。